

# 以領袖為名？由《海峽時報》窺探新 加坡紀念地名的文化政治\*

葉韻翠

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 摘要

本文以領袖地名為中心，探討後殖民時期新加坡以政治領袖進行公共空間命名／更名過程的文化政治，藉以挖掘新加坡政治與社會文化中之特殊面向。具體來說，研究目的有以下兩點：第一，探究新加坡以領袖名字所進行的公共空間命名及其特色；第二，剖析新加坡領袖紀念地名之文化政治。文中採用 1980 年代以降批判地名學的觀點作為研究的方法論。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選取新聞報章中曾經公開討論，或以其作為命名紀念的部長級以上的政治領袖作為分析對象。析論的取材來源主要來自於殖民時期以來發行量大且歷史新聞保存完整的《海峽時報》。研究結果顯示：雖然新加坡一向被視為是一個威權體制的國家，但近十幾年來在地名政策的實施過程中，似乎反而展現出一種較為自由、競爭的社會論述面向。公開的領袖紀念地名議題可說是官方決策進行前的風向球，藉由將領袖紀念議題拋出廣為周知，來喚起人民對於建國領袖與國家認同的注意。新加坡雖處於後殖民時期，但領袖紀念議題與去殖民無關，而是透過對形塑現代新加坡有功的近代人物的崇敬，彰顯國家認同。不同於威權體制下的台灣與大馬時常利用公共空間的命名進行領袖崇拜與紀念，後殖民時期新加坡領袖地名的命名過程為一競爭、協商的紀念政治，反映出新加坡的威權形態與政治有其特殊性。

**關鍵詞：**紀念地名、政治領袖、文化政治、後殖民、新加坡

\* 本文為國科會 102 年度補助的專題研究計畫之一部分，計畫名稱：「以領袖為名：吉隆坡與新加坡兩個後殖民城市地名的紀念政治」（NSC 102-2410-H-259-044-）。

## 壹、前言

### 一、動機

脫離長期英國殖民統治而於 1965 年獨立建國的新加坡，由於國家新建、島嶼面積狹小、馬來—伊斯蘭世界環抱、島內族群複雜等因素，國家認同是長久以來國家安全考量中的重要一環。如何透過各種軟體、硬體政策，將其多元族群整合成具有新加坡國家意識形態的「One Singaporean」一直是政府努力的目標。當中，普遍存在於常民生活中的地名亦被挪用作為政治媒介，地名的抹除、更名或新命被視為是形塑新加坡國家認同的重要手段。早在獨立之前自治政府官員即思考如何透過地名的更名及新命去除殖民色彩，置入屬於新加坡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元素（*Straits Times*, 1958.05.20）。在獨立建國之後，透過地名整合族群、建構一致的國家認同感，更明顯的表彰在各時期推行的地名政策目標以及具體施為之上（可參見 Yeoh, 1996; Yeh, 2013）。而在新加坡的地名政治中，領袖地名的存在別具意涵。

領袖地名是一種紀念地名的形式，是帶有強烈且特殊政治色彩的象徵符號。在葉韻翠（2013）的研究中指出，領袖紀念名可以藉以窺探國家當權者所欲表彰的政治主張及態度，其文化政治顯示出不同政治想法間的權力協和與爭鬥。獨立後的新加坡借用這些幫助建構現代新加坡國家有功的建國一代領袖名字來進行公共空間的命名，透過集體記憶的創造向人們灌注一種國家的認同感<sup>1</sup>。因而出現了諸如以第一任總統名字命名的尤索夫伊薩中學、以第二任總統名字命名的薛爾思橋、薛爾思連道等地名。而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隨著第一代甚至第二代國家領袖的相繼辭世，新加坡官方與民間對於如何以領袖名來作為「國家紀念地名」，展開了一連串的熱烈討論。

<sup>1</sup> 新加坡 2014 年為老人推行的健康福利政策，將 65 歲以上且 1987 年以前成為新加坡公民的人稱為「建國一代」（Pioneer Generation）。

在過去針對新加坡地名的研究中，Yeoh (1992, 1996) 分別針對英殖民下的街道名特色，與獨立後新加坡政府如何在街道名政策中注入國族理念進行討論；Yeh (2013) 則以遭抹除而消失的地名為中心，由另一種角度探討新加坡政府透過地名的刮除建構國家認同的方式。但在這三篇研究中皆未觸及與塑造國家認同有高度關聯的領袖地名。是故，令人感到好奇的是，到底新加坡如何以領袖地名作為媒介打造國家認同感？其文化政治為何？對於處於後殖民時期的新加坡又象徵什麼意涵？這些尚未解答的疑問仍有待進一步地探究。

## 二、研究目的與方法

綜上所述，本文擬以領袖地名為中心，探討後殖民時期新加坡以政治領袖進行公共空間命名／更名過程的文化政治，藉以挖掘新加坡政治與社會文化中之特殊面向。具體來說，本文所要達到的研究目的有以下兩點：第一，探究新加坡以領袖名字所進行的公共空間命名及其特色；第二，剖析新加坡領袖紀念地名之文化政治。希望藉由上述兩項目的的達成，呈顯後殖民時期新加坡政治社會發展之一面。

在研究方法方面，筆者主要選取在新聞報章中曾經公開討論，或以其作為命名紀念的部長級以上的政治領袖作為分析對象，包含有尤索夫伊薩<sup>2</sup>、薛爾思<sup>3</sup>、鄭永順<sup>4</sup>、吳慶瑞<sup>5</sup>、楊林豐<sup>6</sup>、王鼎昌<sup>7</sup>、黃金輝<sup>8</sup>、蒂凡那<sup>9</sup>、

<sup>2</sup> 原為自治時期的新加坡國家元首（Head of State of Singapore），在 1965 年國家獨立後逕成為第一任總統。

<sup>3</sup> 從政前原先的職業為醫生，被譽為新加坡現代婦產科之父。為新加坡第二任總統。

<sup>4</sup> 曾任教育部高級政務部長，對於工藝及理工教育的推動為其主要成就。

<sup>5</sup> 曾任新加坡財政部長及國防部長，對於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有極大貢獻。

<sup>6</sup> 曾任教育、衛生、通訊等部長，在普及化教育、穩定人口成長及改善交通問題等方面有所貢獻。

<sup>7</sup> 為新加坡第五任總統及第一位民選總統。曾任新加坡交通及勞工部長、副總理。

<sup>8</sup> 為新加坡第四任總統及第一位華人總統。從政前職業為新聞記者，曾任新加坡駐外大使。以個性平易近人的平民總統形象深植人心。

<sup>9</sup> 為新加坡第三任總統及第一位印度裔總統。在 1961 年全國職工總會（NTUC）的設立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拉惹勒南<sup>10</sup>、林金山<sup>11</sup>、李光耀等。析論的取材來源主要來自於新加坡殖民時期以來長期發行的《海峽時報》（*Straits Times*）。選擇《海峽時報》作為分析素材的原因有下列幾點：1. 發行量大—廣大的讀者群意味著新聞可傳播、影響的群眾廣泛；2. 歷史新聞保存完整—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的歷史報紙全文資料庫（NewspaperSG）中可檢索到所需建國以迄 2009 年的歷史報紙，而 2009 年以後的《海峽時報》新聞則可直接透過《海峽時報》網站進行查詢<sup>12</sup>；3. 闢有《論壇》（Forum）討論區—《海峽時報》中除了對於政府的地名政策、實施有所報導之外，其所闢建的《論壇》更成為擁有各式想法的讀者表達意見及政府官員進行回應的一個互動場域，相當有助於本研究之進行。

## 貳、觀點：領袖地名、公共紀念與國家認同

地名不僅是一種語言的符號，更展示了社會與歷史價值，而紀念地名更帶有政治價值，可以與政權相連結，並且展現其意識形態（David, 2011: 215-16）。地名地景的書寫與重寫過程不僅論證了文化與政治之間的關連，也顯示了權力關係如何塑造紀念的優先權並藉以創造公共記憶（Azaryahu, 2011: 28）。在各種類型的地名當中，紀念地名時常與國家認同議題產生互動，有助於國家身分認同的建構（Azaryahu, 2009: 53）。因此當近代國家挪用了對於公共空間的命名權，以其環境識覺架構了一套地名命名系統時，地名所帶有的符號往往成為一種政治表述的象徵，並且時常與國家認同有著高度關聯。像是美國獨立之初在國族主義的狂熱之下，時常運用如華盛頓（Washington）、法蘭克林（Franklin）、傑佛遜（Jefferson）等國家領袖的名字來作為公共空間的命名（Stump, 1988: 203）。

不同於其他類別的紀念地名，領袖地名之意義在於領袖的族群身分、

---

<sup>10</sup> 新加坡獨立後的第一任外交部部長，以外交專長著稱。為人民行動黨的創黨元老之一。

<sup>11</sup> 新加坡建屋發展局第一任主席，在政府組屋的規劃與興建的草創階段上有很大的貢獻。

<sup>12</sup> NewspaperSG 資料庫網址為 <http://newspapers.nl.sg/>；海峽時報線上新聞網址為 <http://www.straitstimes.com/>。

政治主張、意識形態、個人特質或社會貢獻，都可能附加在「領袖名」這個符號之上，成為被挑選作為公共紀念的原因。例如在美國可見到廣泛使用人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恩的名字來作為公共空間的命名，傳播族群平等的理念（參見 Alderman, 2000）。而馬來西亞則有許多地方以其國父東姑阿都拉曼的名字作命名，以尊崇其溫和的政治作風與族群和諧的想法（參見葉韻翠，2013）。

然而由於官方與地方之間，或者不同群體間對於「領袖」所持的不同定位與論述，以及對於是否紀念、如何紀念持有不同看法，使得領袖紀念及領袖地名成為一個高度競爭的場域。在 Vinitzky-Seroussi (2008) 的研究中揭示，耶路薩冷以及特拉維夫 (Tel Aviv) 兩地在相異的國家身分認同論述下，對於如何紀念已故總理拉賓 (Yitzhak Rabin) 有著不同的想法與表現，因而分別透過了遺忘與紀念兩相異手法進行展現。而 Gerwarth and Riall (2009) 針對德國俾斯麥 (Bismarck) 及義大利加里波底 (Garibaldi) 的研究另顯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這段期間，在變化的政治環境下對於這兩位被建構為國父的人物進行不同的挪用與詮釋以符合當時的政治需求，表現出高度碎裂的社會如何在快速變遷的歷史中尋求建立一種歷史連續性的方式。另外，美國官方曾將佛羅里達的 Cape Canaveral 及 Mount Denali 分別更名為已故總統甘迺迪 (John F. Kennedy)、麥金利 (William McKinley) 之名以作紀念，卻遭到地方人民強烈反對，人民主張原有地名有著自己的由來與歷史而拒絕變更，使得這兩項官方命名最後仍更改回原有的地名 (Monmonier, 2006: 5-6, 74-76)。而新加坡官方與民間對於建國一代政治領袖的紀念方式亦存在多元的聲音，使得領袖紀念地名並非只是單純官方決策下的產物。

由於領袖紀念本身就是一個高度競爭的議題，領袖地名也同樣的容易引發許多的爭議。因此本文將新加坡的領袖地名視為是一種特殊的政治論述，且這樣的政治論述並非「定論」，而是不斷地處於一種競爭的、辯證的狀態之中。

## 參、新加坡領袖名紀念政治的爭鬥

新加坡的國家發展走過了建國困頓的草創時期以及後來的經濟起飛，呈現了一片繁榮富裕景象。但在邁入二十一世紀之後，這些對於國家發展有重大貢獻的第一代甚至第二代領袖們卻日漸凋零。年輕世代們對歷史記憶的遺忘，以及對建國領袖的貢獻也越來越不熟悉。在王鼎昌、黃金輝、蒂凡那、拉惹勒南、林金山、吳慶瑞等相繼辭世後，為了讓當代及未來世代的新加坡人能夠了解建國一代所付出的努力，以增進他們對於國家的認同感，領袖紀念議題被公開的提出，並持續在新加坡的官方與民間中發酵。如何以領袖名命名公共空間更是存在著許多不同的主張與意見，在《海峽時報》為讀者們開闢的〈論壇〉討論區域中，出現了諸多的想法交流。

### 一、領袖紀念議題的提出

以領袖名稱進行公共空間的命名對於新加坡社會而言並不陌生。早在 1966 年政府即透過更名的方式開設了尤索夫中學。1981 年將東海岸公園大道（East Coast Park Way）末端新建的橋樑命名為薛爾思橋以作紀念。但即便如此，以領袖名字進行空間紀念並不是一項普遍的做法，二十世紀的《海峽時報》中關於領袖地名的討論也較少而零星，且領袖地名的提議並不引起有關當局的興趣。例如，1984 年加基武吉（Kaki Bukit）的國會議員 Saidl Shariff 認為教育部應以地方領袖名來命名學校，而非僅依照學校所在的位置、道路來作命名依據，且應該讓草根領袖參與命名的過程。但教育部僅以學校命名委員會中已包含選區議員作為回應（*Straits Times*, 1984.03.14）。1994 年上尉 Vaidynathan Mohan 寫信到《海峽時報》論壇，建議國防部將新的武裝部隊軍事訓練學院中的重要建築，以貢獻卓越的部長及士兵的名字來命名（*Straits Times*, 1994.06.29）。然而國防部的回應卻是認為，雖然國防部有許多貢獻卓越的領袖，但以個人的名字來命名軍事建築並不是國防部的習慣，應有其他方式可以表達紀念<sup>13</sup>（*Straits Times*, 1994.07.02）。

<sup>13</sup> 這項提議當時遭到否定，但相隔 17 年後在領袖紀念議題的發酵之下，武裝部隊軍事訓練學院中的新加坡指揮與參謀學院被更名為吳慶瑞指揮與參謀學院。

長期以來新加坡政府高度對於國內的媒體與文化進行控制，傳統載具新聞報紙僅被定位為告知（inform）與教育社會大眾的功能，並透過 1974 年制訂『新聞與印刷出版法』（*Newspaper and Printing Presses Act*）進行嚴格的規範（Lee, 2010: 131）。《海峽時報》雖自殖民時期以來開闢有〈論壇〉區域，但讀者來信能發表的內容與性質相當有限。直到進入了 21 世紀，在國會議員與國務資政透過報紙公開的倡議領袖紀念地名之後，在這個被設定的「政治」議題之下，才表露出人民較多不同的想法。

最先在 2001 年 6 月 3 日的《海峽時報》刊登了人民行動黨（簡稱 PAP、人行黨）國會議員伍碧虹（Irene Ng）所發表的觀點〈讓我們開始一項紀念已故領袖的傳統〉（*Straits Times*, 2001.06.03），掀開了新加坡領袖名紀念政治的序幕。文章刊登後新加坡社會中漸漸地開始有一些對於如何紀念辭世領袖的想法與做法出現。其後隨著一個個政治領袖的辭世，領袖紀念地名的議題更逐漸地被炒熱了起來。在過程中，新加坡政府曾拋出了兩件關於領袖紀念地名的議題，在《海峽時報》論壇上引起了社會大眾熱烈地的關注與討論。其一是 2006 年 12 月由國務資政吳作棟提出的議題，建議新加坡的公共空間可以領袖名來命名以表達紀念。另一則是 2013 年 11 月由文化、社區及青年部代部長黃循財（Lawrence Wong）所提出的想法，表示新建的國家體育館或新加坡室內體育館可以以人名來命名。

### （一）吳作棟的領袖地名提議

2006 年 12 月 2 日國務資政吳作棟在參加丹絨加東中學 50 周年校慶時提出了一項思考方向。有鑑於人們對於近來逝世的黃金輝、蒂凡那、拉惹勒南、林金山等第一代政治領袖的不熟悉，他認為新加坡的街道、公共建築、公園、學術及研究機構等公共空間，可以以國家現代開創者、慈善家、社會勞工、領袖及其他來命名以資紀念（*Straits Times*, 2006.12.04）。這項提議立即獲得一些國會議員及政府官員的支持與贊同，也引發了後續在《海峽時報》專欄意見與論壇上的討論。這些回應討論中包含有正、反兩造不同的意見，約略可以歸納為下列幾種想法：其一，贊成以領袖名來進行空間紀念，並認為應當將紀念的人物及方式加以擴大；其二，強調紀念物的

選擇要能夠反映領袖的角色或有所關連才有意義；其三，雖表示贊成，但認為若以更名方式進行紀念將造成民眾生活上的困擾與不便；其四、認為舊地名代表著歷史，不應該被更名抹去；其五、主張街道主要作為方向、位置標示功能，建議以數字標號及方位來作為街道命名系統。

為了澄清上述第四點反對的意見，吳作棟更明確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表示可將對新加坡意義較小的殖民官員地名，更名為對新加坡具有貢獻的近代人物（*Straits Times*, 2006.12.17）。這項想法再次引發公眾的討論。有民眾表示贊同，並提出柏盛小學、麥里芝蓄水池可做為更名的對象（*Straits Times*, 2006.12.21），另有學者認為若要以更名方式進行紀念，數字街道名應當是比較好的對象（*Straits Times*, 2006.12.31）。但針對這兩項提議卻有其他的民眾持著不同想法，認為柏盛、麥里芝並非是不重要的官員，而是對於新加坡早期發展有重要貢獻的人（*Straits Times*, 2006.12.23），另外，數字街道名更名亦會造成民眾使用不便，且對於以領袖名進行更名能否真的增加價值或特徵表示存疑（*Straits Times*, 2007.01.07）。而其他的意見則認為如果要進行紀念的話，以新的建物來命名應該是比較好的方式。

## （二）黃循財的體育館命名議題

2013 年 11 月 11 日文化、社區及青年部代部長黃循財拋出了另一項紀念地名的議題供社會大眾思考。他表示新建的國家體育館或新加坡室內體育館，可以以對整個國家有足夠影響力的人名來命名。這項議題一出來之後立即得到了一些回應，認為目前新加坡並沒有這樣的運動員足以以他們的名字來命名（*Straits Times*, 2013.11.14）。

後續在《海峽時報》論壇的來信中，逐漸將這項議題導引到以李光耀來作命名。在 11 月 16 日同時有兩篇來信回應黃循財的議題，認為這個命名不應該只侷限在運動員，並皆建議以李光耀作為命名來表揚他對國家的貢獻。有趣的是，兩篇來信一經刊登後在 11 月 20 日又有三篇來信進行回應。當中有一篇反對以李光耀作為命名依據，認為體育與政治無關。另外兩篇雖沒有直接指涉李光耀，但反對以個人作為新體育館的命名，認為仍然應該以國家體育館，或者以其他可以反映新加坡在體育上不分族群、語

言、宗教這樣特質的名稱來命名。11月25日又有另外兩篇來信，一則建議新體育館應能夠反映與大多數新加坡人有關的文化或歷史面向，而提議以加冷獅吼體育館（Kallang Roar Stadium）來作命名<sup>14</sup>，另一則為區位取向，提議以所在地來命名而名為加冷體育館（Kallang Stadium）。另外，在11月28日的讀者來信則認為新體育館應以運動員來命名，並認為應該有比體育館更大、更適合以李光耀為名的東西，提議未來可將樟宜機場更名為李光耀國際機場。

這些對於體育館命名的建議後來由文化、社區及青年部在11月29日一起進行回應，表示新體育館如何命名尚未決定，歡迎社會大眾繼續多多提供建議，作為未來命名時的參考。

## 二、競爭（contesting）的紀念政治

由這兩項議題所引發的回應，再對照本研究蒐集到《海峽時報》中曾出現關於領袖紀念地名的提議（參見表1），我們可以窺見新加坡社會對於領袖紀念地名所持有的想法。吳作棟、黃循財所引發的領袖名紀念政治，成功地將社會大眾的思維導引到領袖紀念與國家認同的議題上，雖然兩個議題（更名／新命）都包含有正、反兩造意見，但顯示出的紀念政治略有不同。

地名更名基本上存在著對人民造成不熟悉感、信件寄送、地圖重新製作，以及店家在廣告及宣傳上的花費損耗等實務面問題（Monmonier, 2006: 123）。而就情感層面而言，由於人們已經將自己及日常活動與地方相連結，因此地名成為身分認同的一項要素（Randall, 2001: xiv），這使得更名進行時易遭受反對。在吳作棟所提出的議題中，「更名」是主要的紀念手段，也因為更名的過程包含著舊地名的抹除與地名的新命，引發的爭議較大。贊成者仔細考量到了紀念地名與領袖間的關聯性、空間位階與領袖身分等相關問題，因此提出的紀念物多與領袖生平有所相關。這些詳細考慮領袖

<sup>14</sup> 1970年代新加坡國家足球隊在大馬金杯足球賽（Malaysia Cup）中屢獲佳績，而熱情激烈的民眾在國家體育館（位於加冷）每每發出如獅吼般的加油歡呼聲音，因而被稱為加冷獅吼。

地名命名的空間觀點，在美國黑人社群考量如何以地名在空間中紀念金恩時，以及馬來西亞東姑地名的命名時同樣可見（參見 Alderman, 2003；葉韻翠，2013）。反對者部分由實用主義觀點出發，或認為更名需耗費金錢及造成不便，或認為地名的主要功能為方向標示，並不適合做為空間紀念；部分則認為舊有地名帶有地方歷史與情感，即便是殖民官員地名亦是新加坡發展歷史的一部分，歷史真實性不應被抹除；或有甚者直言國家不應該干涉常民空間，否則這樣的紀念可能會招致反效果。這種基於政治的、經濟的、歷史的因素來反對（殖民）地名變更，也曾經發生在 Swanepoel(2009) 所研究的南非行政首都普利托利亞（Pretoria）名稱的更名上。

而至於黃循財所提議的體育館命名，由於是屬於地名新命，免去了更名所造成的疑慮。在這場地名政治中呈現了領袖紀念、實用主義、不同的國家論述三者間的爭鬥。就提議以李光耀來做命名者而言，領袖象徵著國家，因此建議以之命名國家級的體育館以符合領袖的位階。反對者有的則由實用主義出發，認為應以區位或是國家來命名體育館；有的則不贊成以人名，而是認為可以以象徵新加坡共同的歷史文化，或能反映體育不分族群、文化色彩的特質思考命名方向。

是故對於「是否」以及「如何」以領袖名進行空間紀念，在新加坡社會中存在著不同的意見表述。在由人行黨國會議員、政府官方導引驅動的領袖紀念地名的文化政治中，雖然有許多如何以空間形式紀念領袖的方式被具體的提了出來（參見表 1），但這些建議並沒有真正被採用。換言之，提議中的地名仍維持原先實用主義取向的名稱。因此在對於公共空間的命名議題上，國家認同、地方認同、實用主義等三種不同思維間的相互角力，是同時存在於官方與人民之中。雖然我們無從得知三種思維在新加坡社會所佔的比例為何，但由 2005 年樟宜機場公開徵求新航廈的命名及票選一事來看，雖有以已故總統之名的命名提議，但票選結果最後仍以「廉價航廈」一名來命名（*Straits Times*, 2006.01.13），顯示在地名的文化政治上，人們的實用主義傾向可能仍勝於領袖紀念。有趣的是，這種純粹理性、科學、解決問題導向、免除意識形態考量的實用主義，一直是新加坡國家立國以來引導國家內政與外交施為的官僚政治意識形態，也成為長期以來新加坡

人思考邏輯的重要形式（Barr, 2005: 8; Khan, 2001: 4）。當政府轉以訴諸國家歷史意義與情感提出領袖紀念地名議題時，人們卻不免仍以實用主義來考量地名的命名。

表 1：《海峽時報》曾出現的領袖紀念地名提議

領袖	最高經歷	建議的紀念物	方式	出處
Goh Keng Swee (吳慶瑞) 1918.10.06-2010.05.14	第一副總理	新加坡指揮與參謀學院、見習軍官學校、總圖書館（位於新的武裝部隊軍事訓練學院）	更名	1994.06.29
Yeo Ning Hong (楊林豐)	部長			
Ong Teng Cheong( 王鼎昌) 1936.01.22-2002.02.08	5 <sup>th</sup> 總統	捷運站、新高架橋、新藝術中心、樟宜機場第三航廈	新命	2002.02.15
		王鼎昌航廈 (Ong Teng Cheong Airport Terminal)	新命	2006.01.13
		濱海中心 (Esplanade)	更名	2006.12.04
Wee Kim Wee (黃金輝) 1915.11.04-2005.05.02	4 <sup>th</sup> 總統	街道	-	2005.05.06
		黃金輝航廈 (Wee Kim Wee People's Airport Terminal，新廉價飛機航廈)	新命	2005.05.07
		紀念碑、黃金輝路 (Wee Kim Wee Road，更名加文納路)	更名	2005.05.14
		黃金輝航廈 (Wee Kim Wee Airport Terminal)	新命	2006.01.13
		黃金輝路 (Wee Kim Wee Road)	-	2006.12.31
Chengara Veetil Devan Nair ( C. V. Devan Nair 蒂凡那) 1923.08.05-2005.12.07	3 <sup>rd</sup> 總統	新加坡大會堂 (Singapore Conference Hall)	更名	2006.12.19
Sinnathamby Rajaratnam ( S. Rajaratnam 拉惹勒南) 1915.02.25-2006.02.22	第二副總理 ( 外交事務 )	拉惹勒南文化中心 ( Rajaratnam Cultural Centre，更名濱海中心)	更名	2006.02.25
		國家圖書館	更名	2006.03.04
Lim Kim San (林金山) 1916.11.30-2006.07.20	部長	林金山道 (Lim Kim San Avenue)	-	2006.12.31
Lee Kuan Yew (李光耀) 1923.09.16-	總理	新的國家體育館	新命	2013.11.16
		李光耀國際機場（更名樟宜機場）	更名	2013.11.28

此外，值得再進一步思考的是，在新加坡領袖紀念地名的議題中，官方論述中所例舉的政治領袖僅止於人行黨成員以及與人行黨關係緊密的人，卻不述及昔日殖民體制之下，進行反殖或爭取新加坡自治、建國的自治政府首任首席部長馬紹爾 (David Marshall) 及第二任首席部長林有福，使得官方版的新加坡國家歷史似乎自人行黨執政的自治時期甚至是獨立建國之後開始。而這些早期的歷史記憶與人物也似乎在人民的心中逐漸被忽

略、遺忘，表 1 中呈現的領袖紀念地名提議，同樣圍繞在以人行黨為核心的政治領袖。

## 肆、新加坡領袖及其紀念地名

目前本文整理出來已實施的領袖紀念地名，其命名來源主要為新加坡的前總統、前高級政務部長、前副總理與前總理。包含有第一任總統尤索夫伊薩、第二任總統薛爾思、前教育部高級政務部長鄭永順、第五任總統王鼎昌、第四任總統黃金輝、前第二副總理拉惹勒南、前第一副總理吳慶瑞，以及第一任總理李光耀（參見表 2）。這些政治領袖的共同特徵為出生於殖民時期，經歷過獨立建國及國家快速成長的困頓與繁榮歲月，當中拉惹勒南、吳慶瑞、李光耀更被譽為是新加坡建國之父，對於爭取新加坡獨立有極大的貢獻。如同前述領袖紀念議題的討論，實際上落實的領袖紀念地名同樣圍繞在以人行黨為核心的政治領袖而開展。

### 一、紀念的時間點

從紀念的時間點來看，在已知的資料中除了尤索夫伊薩中學（參見照片 1）以及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取自於在世領袖之名外，大部分的命名紀念發生於領袖辭世之後。易言之，新加坡領袖紀念地名主要表達對已故政治領袖的紀念。這也跟新加坡政府街道名政策中的不以在世者來作命名的想法大致符合（*Straits Times*, 1980.01.11）。相較於其他的領袖紀念地名，尤索夫伊薩中學命名的時間相當的早，為新加坡建國之初。這座中學是在尤索夫伊薩擔任總統期間，由當時的總理李光耀宣布設立，以表示對於新加坡建國後第一位總統的崇敬。而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由時任總理吳作棟宣布建立，以對李光耀長期為國家付出的貢獻表示敬意，並作為李光耀 80 歲生日的祝賀。

其餘的領袖紀念地名主要作為這些卓越領袖的辭世紀念。領袖逝世當年或隔年為紀念地名主要發生的時間點，如在薛爾思逝世當年完工的大橋被命名為薛爾思橋（參見照片 2、照片 3）、王鼎昌逝世當年透過更名而成

的王鼎昌勞工研究所，以及黃金輝、拉惹勒南、吳慶瑞的紀念地名；另外，可發現在政治領袖辭世後的數年，仍持續出現新的紀念，如薛爾思學院、薛爾思道、萊佛士書院薛爾思樓、鄭永順會議中心、王鼎昌工運領袖學院等。

表 2：新加坡領袖紀念地名

領袖	最高經歷	紀念地名		紀念的時間點	身分關聯	方式
尤索夫伊薩 Inche Yusof bin Ishak 1910.08.12-1970.11.23	1 <sup>st</sup> 總統	尤索夫伊薩中學	Yusof Ishak Secondary School	1966.07.29		更名
		尤索夫宿舍 (位新加坡國立大學)	Yusof Ishak House			
		尤索夫伊薩樓 (位萊佛士書院)	Yusof Ishak Block		校友	更名
薛爾思 Benjamin Henry Sheares 1907.08.12-1981.05.12	2 <sup>nd</sup> 總統	薛爾思橋	Benjamin Sheares Bridge	1981.09.26		新命
		薛爾思學院 (位杜克-國大醫學研究院)	Benjamin Sheares College	2010.05.19	醫生	更名
		薛爾思道	Sheares Avenue	2013.12		更名
		薛爾思連路	Sheares Link			
		薛爾思樓 (位新加坡國立大學)	Sheares Hall		1 <sup>st</sup> 名譽校長	
		薛爾思樓 (位萊佛士書院)	Sheares Block	1997 以後	校友	更名
鄭永順 Tay Eng Soon 1940.01.20-1993.08.05	高級政務部長	鄭永順會議中心 (位工藝教育學院)	Tay Eng Soon Convention Centre	2013	開設工藝教育學院	新命
王鼎昌 Ong Teng Cheong 1936.01.22-2002.02.08	5 <sup>th</sup> 總統	王鼎昌勞工研究所 (位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	Ong Teng Cheong Institute of Labour Studies	2002.03	全國職工總會會長	更名
		王鼎昌工運領袖學院 (位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	Ong Teng Cheong Labour Leadership Institute	2009.02	全國職工總會會長	更名

領袖	最高經歷	紀念地名		紀念的時間點	身分關聯	方式
黃金輝 Wee Kim Wee 1915.11.04-2005.05.02	4 <sup>th</sup> 總統	黃金輝腫瘤外 科實驗室（位國 家癌症中心）	Wee Kim Wee Laboratory of Surgical Oncology	2005.08	因癌症逝世	新命
		黃金輝－李氏 基金青年領袖 發展中心（位 全國青年成就 獎金獎得主校 友會）	Wee Kim Wee-Lee Foundation Youth Leadership Development Centre	2005.11	開辦全國 青年成就 獎	新命
		黃金輝傳播與 信息學院（位 南洋理工大學）	Wee Kim We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2006	海峽時報 新聞記者	更名
拉惹勒南 Sinnathamby Rajaratnam (S. Rajaratnam) 1915.02.25-2006.02.22	第二副總 理（外交 事務）	拉惹勒南樓 (位萊佛士書 院)	S. Rajaratnam Block	2006	校友	新命
		拉惹勒南國際 研究院（位南 洋理工大學）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7.01.01	1 <sup>st</sup> 外交部 長	新命
吳慶瑞 Goh Keng Swee 1918.10.06-2010.05.14	第一副總 理	吳慶瑞指揮與 參謀學院（位 新加坡武裝部 隊軍事訓練學 院）	Goh Keng Swee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	2011	國防部長	更名
李光耀 Lee Kuan Yew 1923.09.16-	總理	李光耀公共政 策學院（位新 加坡國立大 學）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2004.08.16	總理	新命



照 1：尤索夫依薩中學



照 2：薛爾思橋（路牌）



照 3：薛爾思橋



照 4：薛爾思連路



照 5：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照 6：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 二、紀念場域

在紀念場域的類型方面，不同於台灣常見的中山、中正地名，或美國廣布的甘迺迪、金恩地名等，時常透過街道命名來傳達對國家或政治領袖的紀念或尊崇（可參見葉韻翠，2014；Stump, 1988）。即便新加坡政府在街道名政策上大力灌注國族建構的想法，但新加坡領袖街道名數量卻相當稀少，僅有由薛爾思橋衍生出的關聯地名薛爾思道及薛爾思連路（參見照 4）兩條道路。尤其特別的是，領袖紀念地名常見於教育研究單位，藉由諸如學校校區內的行政大樓（尤索夫伊薩樓）、教學大樓（萊佛士書院的拉惹勒南樓及薛爾思樓）、會議中心（鄭永順會議中心）、宿舍（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尤索夫宿舍及薛爾思樓）、學院（王鼎昌工運領袖學院、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照片 5）、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照片 6）、吳慶瑞指揮與

參謀學院、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以及實驗室（黃金輝腫瘤外科實驗室）、中心（黃金輝－李氏基金青年領袖發展中心）來進行命名。這些學校教育、軍事教育、社會教育的公共空間成為領袖地名展演的重要場域，透過各式「教育」方式傳續政治領袖為國家所付出的貢獻。尤其是新加坡教育殿堂的國立大學、萊佛士書院，更習以領袖名稱進行校園空間命名。

### 三、紀念場域與領袖生命歷程的關聯

馬來西亞東姑紀念地名的命名往往與東姑的生命足跡有密切的交集，因此東姑地名在空間的分布上別具意義（葉韻翠，2013）。而我們由表 2 這些領袖紀念地名可知，新加坡在以領袖名命名公共空間時，同樣亦考量到國家領袖與該紀念場域之間的關聯，因此領袖紀念地名時常可以反映出國家領袖在某些方面對於國家所付出的貢獻，抑或是可以記錄下該位領袖的生命歷程。這些關聯類別可區分為：1. 求學歷程－萊佛士書院的尤索夫伊薩樓、薛爾思樓、拉惹勒南樓；2. 原先的職業－薛爾思學院、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3. 任職與政治專長－新加坡大學薛爾思樓、王鼎昌勞工研究所、王鼎昌工運領袖學院、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吳慶瑞指揮與參謀學院、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4. 其他－鄭永順會議中心、黃金輝腫瘤外科實驗室、黃金輝－李氏基金青年領袖發展中心。

這些政治領袖不僅見證了新加坡的國家發展歷史，同時更創造並象徵了國家的歷史與記憶。以領袖名字進行空間命名，除了表達對其個人的崇敬之外，更是從不同的發展面向來象徵新加坡這個國家，藉以向人們傳達出一種國家的感覺以塑造國家認同。

### 伍、結論

「命名是一種強而有力的手段以促進身分認同與歷史的連結，並且將人們安置在更廣泛的記憶網絡之中」（Alderman, 2008: 195）。新加坡近十幾年來在建國領袖日漸凋零，且年輕世代逐漸遺忘國家歷史記憶的情形之下，企圖透過領袖地名的命名喚回人們的建國記憶，並作為一種國家紀念。

長久以來在人行黨的主政之下，新加坡一直是一個威權主義的國家。在政治方面，人行黨政府壟斷政治、經濟財政、社會等資源並透過選舉制度的調整使其在歷屆的國會選舉上獨大，遂行「選舉威權主義」（李憲榮，2013：70）。另外，藉由社會的非政治化、選舉制度的調整、政府諮詢管道的設立等方式進一步鞏固了人行黨一黨獨大的威權政權統治（郭慶秋，2013）。在威權體制之下，如何對於人進行有效的掌控，是新加坡政府著重的課題。董娟娟（2005b）認為，新加坡被打造成一個高度的監視社會，對於人民的言論與行為有著嚴厲的控管，甚至在社會中發展為內化的自我監視機制，且即便在網路世代來臨之後，網路管制亦被納為監視社會的一環（董娟娟，2004、2005a）。另外，Lewis 也曾指出，新加坡政府經常在某些方面對媒體的權力進行鬆綁，但卻往往在其他方面進行限縮，使得媒體迄今仍在國家的指導下受到人行黨政府的嚴格管控（Lewis, 2006: 62-64）。而 Lee (2010) 的《新加坡的媒體、文化控制與政府》（*The Media, Cultural Control and Government in Singapore*）一書更深入剖析，新加坡政府如何透過各項文化政策對文化、網路與媒體的自由進行嚴格管控，以箝制新加坡人民的思想與自由。是故即便新加坡在政治世代交替之下，由強調威權主義領導、家長式政治的李光耀，到開放諮商的領導模式、管理式民主的吳作棟（郭俊麟，1998：212-13），以迄目前的第三任總理李顯龍任內，但監視社會與威權型態卻仍持續的干預社會發展。本研究以《海峽時報》作為探究新加坡領袖地名紀念政治的媒介，發現其所開闢的〈論壇〉討論區中，人們可以在這個有限的開放場域中，「自由的」發表對於領袖紀念地名的看法並且與官方有所互動，是一個相對來說較能展現民意的場所。投稿〈論壇〉的信件必須書名真實姓名以及住址以示對發表言論之負責，顯示〈論壇〉中的各項想法必須公開且正式的受到政府及社會大眾的檢視。雖然新加坡一向被視為是一個威權體制的國家，尤其是以家長式領導風格著稱的李光耀總理任內，但近十幾年來在地名政策的實施過程中，似乎反而較能展現出一種相對較為自由、競爭的社會論述面向。

由《海峽時報》刊登關於地名命名、更名的新聞中可知，新加坡對於地名議題較具規模的討論，皆是由政府提出命名、更名議題引導人民共同

參與討論，最後這些包含正、反論述的意見再成為政府實行決策的參考依據。公開的領袖紀念地名議題可說是官方決策進行前的風向球，藉由將領袖紀念議題拋出廣為周知，來喚起人民對於領袖與國家認同的注意。而不論是官方所例舉、實施的或是由人民相應提出討論的紀念領袖，都圍繞在以人行黨為核心的政治人物，顯示更早之前曾為新加坡進行反殖或爭取自治獨立的馬紹爾、林有福等先鋒人物，已在國家歷史中遭忽略遺忘。研究中發現，在〈論壇〉上讀者提議的領袖紀念地名多半沒有被落實，國家認同、地方認同、實用主義等三種不同思維間同時存在於官方與人民之中。實際上出現的領袖名紀念物集中在不同的教育場域，可見新加坡政府亟欲透過「教育」的方式灌輸人民對於國家的認同情感。此外，有趣的是，新加坡雖處於後殖民時期，但其領袖紀念議題與去殖民無關，而是透過對形塑現代新加坡有功的近代人物的崇敬，彰顯國家認同。吳作棟提出將較小的殖民官員地名更名為對近代新加坡發展有關的人物，反而引發了實用主義、地方情感、歷史真實性之爭議。

在威權體制下的台灣與馬來西亞，都（曾）廣泛地利用領袖名對公共空間進行命名，以作為領袖崇敬與國家象徵。而台灣的中山、中正地名大量盤據各種類型與階層的公共空間（葉韻翠，2014），更遠非新加坡領袖地名所能及。不同於台灣與大馬兩國時常透過領袖地名來挹注政治意識形態與對特定人物的崇敬到常民社會，在紀念地名的文化政治上，新加坡政府並未獨斷與廣泛地利用「領袖名」來進行文字地景的命名。相反地，在後殖民時期新加坡領袖地名的命名過程展現出競爭、協商的紀念政治，反映出新加坡的威權形態與政治有其特殊性。

## 參考書目

- 李憲榮，2013。〈新加坡國會選舉制度〉收於施正鋒（編）《當代新加坡民主政治》頁 45-76。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 郭俊麟，1998。《新加坡的政治領袖與政治領導》。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郭慶秋，2013。〈論人民行動黨與新加坡的一黨優勢之發展〉收於施正鋒（編）《當代新加坡民主政治》頁 77-102。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 葉韻翠，2013。〈領袖名與紀念政治：馬來西亞東姑阿都拉曼之個案研究〉《中國地理學會會刊》50 期，頁 37-59。
- 葉韻翠，2014。〈領袖名與紀念的空間政治：台灣的中山、中正地名之比較研究〉發表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主辦「第五屆白沙歷史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行政大樓五樓國際會議廳。10 月 18-19 日。
- 董娟娟，2004。〈威權政治與知識經濟並進下的監視社會發展：以新加坡的網路管制體制為例〉《東南亞學刊》1 卷 2 期，頁 85-135。
- 董娟娟，2005a。〈詮釋新加坡發展的新路徑：監視社會研究的新解與展望〉《台灣政治學刊》9 卷 2 期，頁 107-51。
- 董娟娟，2005b。《新加坡監視社會之分析》。台北：愾藝企業。
- Alderman, Derek H. 2000. "A Street Fit for A King: Naming Places and Commemoration in the American South."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Vol. 52, No. 4, pp. 672-84.
- Alderman, Derek H. 2003. "Street Names and the Scaling of Memory: The Politics of Commemorating Martin Luther King, Jr within the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ty." *Area*, Vol. 35, No. 2, pp. 163-73.
- Alderman, Derek H. 2008. "Place, Naming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s," in Brian Graham, and Peter Howard, eds.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Heritage and Identity*, pp. 195-213. Farham, Surrey, England: Ashgate.
- Azaryahu, Maoz. 2009. "Naming the Past: The Significance of Commemorative Street Names," in Lawrence D. Berg, and Jani Vuolteenaho, eds. *Critical Toponymies: The Contested Politics of Place Naming*, pp. 53-70. Farham, Surrey, England: Ashgate.
- Azaryahu, Maoz. 2011. "The Critical Turn and Beyond: The Case of Commemorative Street Naming." *ACME: An International E-Journal for Critical Geographies*, Vol. 10, No. 1, pp. 28-33.

- Barr, Michael D. 2005. "Beyond Technocracy: The Culture of Elite Governance in Lee Hsien Loong's Singapore." *Regional Outlook Paper*, No. 6, pp. 1-25.
- David, Jaroslav. 2011. "Commemorative Place Names: Their Specificity and Problems." *Names*, Vol. 59, No. 4, pp. 214-28.
- Gerwarth, Robert, and Lucy Riall. 2009. "Fathers of the Nation? Bismarck, Garibaldi and the Cult of Memory in Germany and Italy."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Vol. 39, No. 3, pp. 388-413.
- Khan, Habibullah. 2001. *Social Policy in Singapore: A Confucian Model?* New York: World Bank.
- Lee, Terence. 2010. *The Media, Cultural Control and Government in Singapore*. London: Routledge.
- Lewis, Glen. 2006. *Virtual Thailand: The Media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Thailand, Malaysia and Singapore*. London: Routledge.
- Monmonier, Mark. 2006. *From Squaw Tit to Whorehouse Meadow: How Maps Name, Claim, and Inflam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andall, Richard R. 2001. *Place Names: How They Define the World—and More*.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 Straits Times*. 1958.05.20. "'We'll Change Colonial Street Names'—Ong."
- Straits Times*. 1980.01.11. "Easy-to-Locate Maps on Way: Finding that Block of Flats Quickly and without Tears."
- Straits Times*. 1984.03.14. "More Imaginative Names for Our Schools Please."
- Straits Times*. 1994.06.29. "Midef's Leaders Merit More Tangible Recognition."
- Straits Times*. 1994.07.02. "Mindef Does Not Name Buildings after Individuals."
- Straits Times*. 2001.06.03. "Let's Start A Tradition to Honour Past Leaders."
- Straits Times*. 2006.12.04. "Wide Support for SM Goh's Call to Recognise S'poreans."
- Straits Times*. 2006.12.17. "SM: Change Road Names with Little Meaning for Singaporeans."
- Straits Times*. 2006.12.21. "Out with Names of Lesser Colonial Officials."
- Straits Times*. 2006.12.23. "MacPherson, MacRitchie were No 'Lesser Officials'"
- Straits Times*. 2006.12.31. "Renaming Roads? Start with 1, 2, 3."
- Straits Times*. 2007.01.07. "Rethink Call to Rename Roads."
- Straits Times*. 2013.11.14. "Big Stadium Needs Big Name. Some Feel No Athlete Has Had Enough Impact for It to Be Named after Him."
- Straits Times*. 2013.11.16a. "Name Stadium after Lee Kuan Yew."

- Straits Times.* 2013.11.16b. “Great Way to Honour Lee Kuan Yew.”
- Straits Times.* 2013.11.20a. “Name Sports Hub Venues after Athletes.”
- Straits Times.* 2013.11.20b. “National Stadium Should Retain Its Name.”
- Straits Times.* 2013.11.20c. “Stadium's Name Should Reflect Nation's Unity.”
- Straits Times.* 2013.11.25a. “Kallang Roar Embodies Nation's Unity.”
- Straits Times.* 2013.11.25b. “Iconic Stadiums Named after Location.”
- Straits Times.* 2013.11.28. “More Fitting to Name Airport after Lee Kuan Yew.”
- Straits Times.* 2013.11.29. “Sports Hub Opening: Ministry Replies.”
- Stump, Roger W. 1988. “Toponymic Commemoration of National Figures: The Cases of Kennedy and King.” *Names*, Vol. 36, No. 3 & 4, pp. 203-16.
- Swanepoel, Natalie. 2009. “Capital Letters: Material Dissent and Place Name Change in the ‘New’ South Africa, 2005-2006.” *Anthropology Southern Africa*, Vol. 32, Nos. 3-4, pp. 95-105.
- Vinitzky-Seroussi, Vered. 2008. “Jerusalem Assassinated Rabin and Tel Aviv Commemorated Him: Rabin Memorials and the Discourse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Israel.” *City & Society*, Vol. 10, No. 1, pp. 183-203.
- Yeh, Yun-Tsui. 2013. “Erased Place Names and Nation-building: A Case Study of Singaporean Toponyms.” *Asia-Pacific Forum*, No. 59, pp. 119-56.
- Yeoh, Brenda S. A. 1992. “Street Names in Colonial Singapore.” *Geographic Review*, Vol. 82, No. 3, pp. 313-22.
- Yeoh, Brenda S. A. 1996. “Street-Naming and Nation-Building: Toponymic Inscriptions of Nationhood in Singapore.” *AREA*, Vol. 28, No. 3, pp. 298-307.

# Named after Political Leaders? Probing into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Singapore's Commemorative Place Names from *The Straits Times*

Yun-Tsui Yeh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and Regional Studi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Shoufeng, Hualien, TAIWAN

## Abstract

This research probes into the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course of naming/renaming public space after political leaders in Singapore during the post-colonial period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special aspects within Singapore's political and social culture. The objectives of this research are to first explore the public space named after Singapore's political leaders and their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and to second analyze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such place-naming actions. The result shows that although Singapore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an authoritarian nation, its place-naming policies in the most recent decade somehow exhibit a relatively free and competitive phenomenon for social discussions. Although Singapore has stepped into the post-colonial era, the topic of commemorating political leader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decolonization; instead, it is to manifest the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paying respect to those who have rendered great service to the modern Singapore. The naming process in the post-colonial Singapore does show the style of the limited liberty, a competitive and negotiatory memorial politics indicating certain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are there in the authoritarian form and politics of Singapore.

**Keywords:** commemorative place names, political leaders, cultural politics, postcolonial, Singapore